

叶辛的《华都》：上海史背景前的当代激情中年

林青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0001)

摘要：华都大楼中居住的中年女性各有风韵，她们曾经插队在山乡，精神与生理的压抑使之在今天的大都市里的奔放性格有了铺垫和原因，一位社会学家促成了她们的身体书写，释放个性。老上海的影星骆秀音、新时期电台播音员林月，她们的悲欢故事形成叠印，而从乡村来的钟点工小秋却预示上海年青女性的新的未来。加之比较文学中新的审美发现与感受，如骆秀音与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如姚征冬与赵长天《不是忏悔》中的卞海亮。叶辛的《华都》是海派小说的新收获。

关键词：叶辛；华都；当代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4)05-0035-06

一、百年上海的市井人物长卷

著名作家叶辛精心写作的长篇小说《华都》就是旨在表现百年上海的。叶辛创作的《蹉跎岁月》已经化作人生的积淀，“后知青生活”的众多小说中，《孽债》已经理清，那些到大上海来找爸爸妈妈的孩子们也已成人，独立地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些小说各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同时又为叶辛写作新著增添了助跑的跑道。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那些当年知青的“后中年人”的生活和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几乎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的、具有丰厚历史感的叶辛最近又推出了《华都》。

小说中众多鲜活的中年女性如厉言著、舒宇虹、罗卉、安小琼等自有风韵，读人和待己因基于多年历练而深沉内秀，她们已经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而这些中年女性之内蕴丰富的性格甚至容貌体态之美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百年上海的风月花露在当代陶冶而成的。《华都》中人物命运极其曲折丰富、也最能体现百年上海的历史沧桑感的是这样一位女性形象——骆秀音。骆秀音是老上海的一代影星，她原本是江南一女子，因为貌美，被影业公司老板看中，成了电影明星。但是，又因她拒绝做老板的小妾等原因，成为业余演员，并也成了名。后来的骆秀音历经苦难，在文革中更是因为她有着在上海演艺圈工作的经历而受到当时的权贵人物的猜忌与迫害。为了更好地熟悉与理解骆秀音这个文学人物，我们可以作一番比较，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也是当年的一位上过画报封面的上海美女，并且曾有过在旧社会与电影界接触的经历，但是将《华都》中的骆秀音与她相比，两人的人生经历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性格也有不同的光彩。王琦瑶的爱情生活后来基本是呈一种封闭的态势，她成了生活中的旁观者，只是通过自己的女儿与友人的交往和有限的邻居等人，保持着一种守旧和孤芳自赏的生存状态。至于她最后被一个曾经是熟人的窃贼杀死，这个意外结局的处理则令人想起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里的尼姑妙玉的不幸结局。而叶辛笔下的骆秀音则不同，她因长得漂亮而在婚后受不了婆婆的挑剔，跑到了上海这个繁华的都市，与易卜生笔下出走的娜拉所不同的是，她的丈夫也跟着一起来了。她一直想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且努力去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包括她与后夫杨城的相爱与分离，也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变化剧烈的大时代里，她一次次地受到了时代风雨的冲击，在文革被批斗时遭受众人的欺凌。她最后是在华都的一间屋子里含冤自逝的。王琦瑶和骆秀音是同时代同地域的两位艺术性格不同的文学典型，王琦瑶是一个在社会的基层不无自恋而维护着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女性，而骆秀音则总是被迫地冲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又因她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演艺生涯与当朝文革新贵有牵连而被迫害致死，她内心几乎少有王琦瑶式的那种宁静与悠闲，而是充满着紧张与苦闷。在文革以后，在骆秀音的背景上叠印的新时期人物也是一位年青貌美的女性，她就是广播电台播音员林月，林月也是在华都大楼里走上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尽管林月是一位社会公认的成功人士，甚至于可以说是倍受公众喜爱的“大众情人”，但是，她的内心却有为外人所不理解的、始终解不开的抑郁之结，林月的苦恼更为深广，无人可

以助她解脱。从骆秀音到林月，形成萦绕百年上海的一个不无怪异的波长。

华都大厦是上海外滩地区的 80 多幢大楼的缩影，这幢已经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上海外滩的老式大楼还保留着，里面居住的不是身价百倍的当代暴发户，也不是已经拆迁到上海市郊新住宅区的动迁居民，而是一些人到中年的老居民。那些女性们住到华都来的经历本身也都带着故事，如舒宇虹是因为在文革中她的当大学英语教授的父亲被诬为帝国主义的间谍而被迫离世，她的母亲也已病逝，舒宇虹因患精神病而住院治疗，出院后，原来的房屋已被没收。是罗卉千方百计安排她住进了华都。厉严普则是嫁到华都人家来的。而到了世纪末，骆秀音从前的住宅则在新时代里作为一处文化名人故居而作为上海的旅游人文资源被保留与开发。这些女性住进华都的历史本身就富有各种不同的情节和原因，至于几次提到的在这座古老的大厦里，每逢社会发生一些重大的转变的时候，都会在这里的某一间屋子里出现死人的现象，从骆秀音到林月都是这样，每每产生出牵人心魄的情节张力，因为死亡可以促进生者对于已逝的各种内容的人生实践者的反思和感叹，意外的死亡更使逝者的性格中的某些特殊方面达到极致的程度，具有较多的想象和故事的空间。

作家的视域并未仅仅局限于华都大厦，因为百年上海的构成还有另一大板块，那就是在他们的记忆里还保存着的关于老弄堂的印象，他们的人生轨迹更是与老弄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中关于厉言青及其父母的描绘，使当年的石库门结构、棉纺厂挡车工、“四类分子”、介绍相亲等情景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另外，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华都，也还体现出当时的上海住宅十分拥挤的状况，虽然要比倒马桶、生煤炉的弄堂阁楼要好许多。比如，小说中的这样一个细节反映出，厉言青所嫁的独子雷家田，雷的父母表示，房子虽然不大，只有一间正房，但是煤卫齐全，只要雷家田娶妻，宽大的卫生间里的浴缸可以拆搬到厨房里去合用，两老口搬进卫生间里住，把正房让给儿子结婚。而类似情况在华都里面并不少见。这样，笔者理解为华都大楼就其建筑的本身而言，似乎构成了一种象征，它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前，就以其与老城厢里来的人们的关系和与老上海的弄堂文化共同构成上海城市的本土文化，同时，又不完全等同于千万条弄堂，而预示着当代众多新颖的居民大楼甚至高级商住楼的崛起，成为联系弄堂们与高层住宅们的一座过渡的桥梁。

文革结束后的 20 年来，华都里又时有人家迁出，还有些是夫妻一方出国等等，这样，原本的空间并不宽裕的华都却又在无形中变得宽余了，以致可以发生些新的故事了。本书设计出了一系列互为因果的情节。领导着当今时尚的一批白领人物的总经理罗卉，她投身于商海并任要职，但是商场的风风火火、大富大贵并未使她的感情生活磨损与褪色。罗卉的性格与她在插队时见义勇为甚至敢于在陪同女伴时身带尖刀以防性侵犯的举止是一致的。罗卉发家了，她特意购置了华都的一套房子，让病愈出院却无家可归的舒宇虹住进去。罗卉与解放前后的骆秀音形成了鲜明的比照，骆秀音也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但是，在旧社会，在反右运动时，更在文革中，她虽然早先勇敢的出走了，以后却也总是躲不了逆来顺受的境遇，她总是难以最终解决出走以后究竟怎样不断地好好生活的问题，她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从罗卉与骆秀音这对人物的命运的反差和对比上，我们看到了百年上海的巨大变化给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女性的精神风貌上带来的新姿。

女青年小秋是一位从农村到上海来打工的钟点工，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的新气象，从 60 年代甚至可扩展于 50 年代到 70 年代，跟她差不多年纪甚至还小一些的上海姑娘与小伙们都响应来自北京的号召，上山下乡，远走他乡，对于自己的未来与前途感觉渺茫，甚至还做好在外地扎根一辈子的精神准备，如舒宇虹、厉严背、罗卉、安小琼。而小秋则孤身一人从乡村走进大上海来了，她用自己的普通而切实的劳动，积累与磨练，要在上海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小秋和舒宇虹她们的命运的对比，是时代给上海与上海人带来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即书中的小秋来上海，她是在农村中遭到过强暴的不幸的弱者，心灵已经受到了创伤，而舒宇虹她们当年则风华正茂，还怀揣着身在田头，胸怀五洲的支援世界革命、为解放全人类而作贡献的雄伟志向，奔赴那遥远而陌生的山乡的。小说文本所提供的信息还可以使我们联想下去，在上海，小秋遇到了关怀，而当年在山村，那些女知青则遇到了迷惘、欢乐和痛苦。年青的小秋将来的路还长，在新的时代里，她将会会有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未来，她将会出落得很美。这样，《华都》拥有了一个开放式的小说结构，百年上海也令人有了新的期盼与等待。

二、偷窥、水和裸提：万花筒里的魔法玻璃

叶辛的长篇小说《华都》用了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们的渲泄的情欲，他们在寻求都市里的狂欢。那些中年男女们总是有意外的艳遇，总是在喜悦中放纵。众多激情的画面，跳跃性很强的人物性格，一切明媒正娶、按部就班的婚恋过程都可以付诸缺如，连一见钟情的快速到了现在也都显得太古典了，通常所说的“婚外恋”的概念也已经不能说明这种状态了。唯一而不是第一的目的和过程就是性的发生，其中女性的主动已成新潮，如舒宇虹就是以自己的全裸与完全陌生的姚征冬相见并且相交的。当然，他们不是外星人，而是经历了要比现在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们多得多的艰苦历程，小说中又有其他一些章节，比如写她们曾经插队在山乡，精神与生理的压抑和对于环境的撞击或被俘虏，使之在今天的现代大都市里的恣肆奔放有了性格的铺垫和原因，也为读者的想象力和对故事情节的补充提供了宽适的空间。至于对当年文革期间由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众多知青的青春期的性苦闷，使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现在的生活和心态变得很合理。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使读者意识到当年的痛苦是当今这种中年后的如此不倦地投入人性的狂欢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那种来自山乡的已婚和未婚的、当官的或者痴呆的男人们的野性的激情所造成的影响，今天仍然没有消失在灯红酒绿之中，而是潜伏并被激活在那些早已从山乡回到大都市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们的心中 and 身上。这种以性占有的方式体现出来的野性是粗犷的、本能的，也是具有来自大自然的天然美的，表现在女性的身上也就显得更美。如果说，叶辛的另一部成功之作《孽债》是写那些回城青年如何打理一个个家庭，特别是处理好由他们的孩子所体现出来的、个人的命运的种种纠葛与矛盾，而且表现出那么多的由历史造成的无奈的话，那么，在《华都》中则避开了绞尽脑汁构思众多人物间的复杂关系，而是让他笔下的曾是经历风雨后的返城知青的男女主人公们重在肉欲的欢乐。

在《华都》中，“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约会与卿卿我我的谈情说爱已经完全被偷窥和主动出击所取代了。在生活中，许多事物都因高科技的先进技术和更趋文明的管理方式而变得透明开放的时候，都市中生活的人们的窥私癖以及窥阴癖几乎成了其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到人的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如那些过度热炒名人明星的种种隐私的媒体，等等。时代的列车毕竟已经驶入 21 世纪的当代了，外国的在性方面的开放意识，给社会群体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的从心灵深处发出的欢愉和自由，《华都》展现了当代都市人往往不再满足于这种偷窥或者由此而产生的意淫与手淫，而是在两性之间直接的作性的挑逗和交合。而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有权或有钱或二者兼备的人“包二奶”、找“小蜜”等现象都成了屡见不鲜的公开风气。小说《华都》的热烈坦荡的性爱描写使得不为传统的婚姻关系所束缚的性爱又冲出了见不得人的遮遮掩掩的地下活动的范畴，首先在当代小说给其光明灿烂的一席之地，既延续和发扬了 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又形成了对于文革以及文革结束以前的对人性种种压抑和摧残的再批判。

水，又是《华都》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小说意象。其中的作用主要的不是饮用，而是沐浴，人物在沐浴时使身体清洁、温暖，进而产生情欲，包括自己的情欲被激发，包括情人的情欲，还包括引起别人由偷窥而产生的情欲。偷窥的情节是在小说的不同场合中以不同的性质出现的。早在山乡时，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于人性的压抑，使知青的爱情以不无扭曲与变形的形式出现，而即使是这样，这种性爱生活还是 21 世纪的种种性爱故事的前奏与前戏。如女知青甘小琼在山乡知青宿舍里沐浴时，受到一个痴傻男子的偷窥与嘻笑，这也导致了在精神上“失贞”的她最后下嫁给那个男人；而在回城以后，厉言青和姚征冬的再一度婚外幽会于住宅里，两人便一起沐浴在家庭浴池中，等等，这两个情节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有机联系。裸露是一种展示方式，而用温水沐浴，更是在滋润、在唤醒性器官的冲动和内心的焦渴方面，起到一种助剂的作用，为引向人与人的相恋相合作出一种铺垫。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阴阳五行中要数水与爱情最贴近，“水性杨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水与裸体结合在一起，便使爱情更加具有动感，更有感官冲击力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小说中所涉及的水的群体中还有一个未可忽视的意象，那就是黄浦江，浦江给上海的形成和新的不断发展不断带来活力，因水建市，她是上海百年前开埠的重要渠道，黄浦江是长江中下游冲击平原上的上海的一个伟大象征，黄浦江又因其通向吴淞口、连着东海与长江并直往太平洋而显示出其包容与开放的云天襟怀。同时，也与《华都》中水与上海人的以情欲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生命力形成一种呼应。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著名的九叶派诗人辛笛曾写过这样一句诗：“智慧是用水写成的”。《华都》中的那些由青年到中年的女性的智慧也是用水写成的，是水使她们变美，也变得聪明。

叶辛在这部小说中还有新探索，当年的山乡知青集体户十几个女性住一屋，当这些下乡知青再早些或者刚返城的时候，又

在很窄弄堂里的狭小的房子里与家人挤住在一起，即使成家了，夫妻房事也会受到仅一板之隔甚至一帘之遮的条件限制，会因唯恐惊扰其他家人的心理而影响质量。而现在不同了，华都这幢隔音条件极好的大楼中把人们分隔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空间，而正是由于这种典型的现代人人与人互相隔绝的生存状态，使他们彼此之间更有了互相彻底交往的需要，其彻底的标志，就是在异性面前全部裸体与赏抚对方的裸身。人的身体是思想的直接与初始的载体，性器官是人的生命胴体的花朵与花柱，它们的绽放与挺拔都是美的、诗意盎然的。如果摆脱了传宗接代等世俗功利目的的话，那么，这种花朵或者花柱正是在互相吸引、交合的时候，把这种融汇人性和人体的美表现得更加光辉灿烂。

在《华都》中还有一个不无奇异的现象，即当代风流情种姚征冬并没有与比他小二十多岁的钟点工小秋发生性关系，虽然近在咫尺、垂手可得，虽然小秋对作为雇主的他也有真情和好感，虽然，小秋从前曾经被人强暴过，因而照传统观念来看，即使跟她相合，也似不必为她的贞操而感到自责，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原本最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没有发生。由此可见，作家仍然把这部小说始终定位于中年人，而在艺术结构上，这个处理则如国画艺术中的留白，使姚征冬与同龄人之间的灵与肉的对话具有更为纯粹的内涵。

三、置《华都》于比较文学

开埠后一百多年来的大上海是抒写不尽的，再多的不同审美视角的作家、再多的艺术风格迥异的小说都不嫌其多。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在反映上海生活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中，幸好我们的文学中有过茅盾的《子夜》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两部在时间上有着连续性的作品都是以在上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和遭遇作为题材的，《子夜》是写 30 年代的他们的实业救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而《上海的早晨》则写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的 50 年代最终走上并完成了公私合营、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即实际上是在相当的时期内取消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活动。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活动作为主线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文学成功。至于反映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由民族实业家和银行家等构成的上海贵族阶层，在后来的政治风暴十分激烈的六七十年代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败落与矛盾，则由女作家程乃珊的小说《蓝屋》所完成。而在《子夜》与《上海的早晨》这两部小说中，两位作家还以副线的笔墨分别描写了上海的普通工人与市民的生活以及爱情，这个方面则一向被文学评论家们忽略。而 50 多年来的上海作家中，仅有胡万春曾经对旧社会底层的女工、女佣的生活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对于工人和市民，茅盾反映集中于闸北区一带，周而复反映的则是在杨树浦地区，这些多是纺织厂的女工，人物的年龄多在三四十岁。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叶辛的《华都》继承了茅盾、周而复的描写上海市民的这部分文学传统，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历程，作出精心的构思和描绘。但是，叶辛在写法上却没有追随茅盾小说的带洋气的绚丽（即使他写工人及住宅区也很有西洋油画感）和周而复小说中渲染的新社会的清新，50 年代初，那些女工们的身穿的布衫总是散发出洗净又晒干的爽洁气息，而是更多地揉和了 30 年代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的《秋海棠》中的斑斓笔意，其实，无论处于怎样的时代，上海总有它的杂色斑斓存在的。叶辛以自己所熟悉的黄浦区的外滩地区中，具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弄堂为背景，新著《华都》精心描写了一群 70 年代之前的上海社会基层中年男女以及他们的青年时期，捕捉了他们的微妙的各种心理活动。在叶辛的笔下，因姐姐已经插队务农的厉严着按照当时的条件规则，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做了一名纺织女工，她在自己工作的纱弄里可挡一千八百锭纱了。纺织厂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确是上海的最主要的工业基地，而且厂里的女工们的故事和命运也富有文学的审美情趣。

性爱是人性一个重要的表现，也是文学中的一个不朽的命题。中国现代小说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好的是《子夜》。虽然，《子夜》中的性爱描写主要体现在吴荪甫、赵伯韬两个工商业金融巨子以及他们周围的某些女性的身上，但是在工人住宅区中也还有一些爱欲描写，主要集中在几位领导罢工的地下工作者。如苏伦对玛金的爱欲，同时，地下党工作者的黎八要调玛金到他那里“住机关”，并在说动领导人克佐甫答应他，就是为了“为着两边的工作”。同样是“忙着两边的工作”的还有阿英、蔡真，用苏伦的话解释，即“性的要求和革命的要求，同时紧张！”蔡真的咬玛金的后颈、亲吻陈月娥的行为，则有同性恋的倾向。这部分描写体现了当时风行的“革命的浪漫蒂克”。从居住环境来看，《华都》里的弄堂与《子夜》里工人区的密集杂乱也颇有相近之处。《上海的早晨》所描写的最动人最复杂的是资本家徐义德与他的三太太林宛芝的婚恋关系。林宛芝年青貌美，向往包括爱情在内的平等自由，但又性格柔婉、难以摆脱附庸于人的情感与现实的纠葛，她的命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同情。而书中的年

青工人们的爱情则体现出一种在新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刚建立以后，刚“当家作主”而脱离了原有社会地位和环境后清新明朗但又不无怯生生的感觉，作家周而复对于工人的爱情描写是含蓄的、朴素的。此后，随着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的进行，人性受到种种压抑，有不少人甚至受到迫害。直到文革结束，对外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当代中国小说理应对这一重要现象作出文学的塑造和表达了，30年来，张贤亮、丛维熙等作家表现的是人们在被监禁和劳改时的爱情与性爱。这种压抑的性爱小说，直到以青年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为代表的一批风格全新的上海青春派小说的出现才被彻底的解放，为更多的读者所嗜读。叶辛的《华都》则集中展现了当今的中年市民的性的狂欢。如果说，张贤亮小说中的性爱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度匮乏时的替补，那么叶辛小说中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基本满足后的人生的奢侈；卫慧、棉棉小说中的性爱是青年人对生活找不着理想和寄托时的宣泄，那么，叶辛小说中的则是中年男女们对于人生的意义和前路完全明了以后的快乐梦境。

比较和鉴别更能使某一事物的本色彰显。近几年来，描写上海中年人的感情生活的小说不断出现，其中，以写都市上海的中年人生活和爱情见长的还有一位作家是赵长天，他的《不是忏悔》、《肇事者》、《又见许鹤》等长、中篇小说也写了中年人的爱情和婚外恋。但是，却与叶辛的风格并不相似。赵长天塑造的中年人的感情也是十分真挚热烈而丰富的，其中，有对于比自己年少的女性的青春美的渴慕，也有中年男女之间因心灵相通而产生的情欲。但是，他笔下的人物言谈举止所体现的性格，则犹如酒宴中的一道点心“火烧冰激淋”一般，常常在奔放中蕴有理智与压抑，以赵长天的长篇小说《不是忏悔》与叶辛的《华都》作比较，前者的卞海亮是个大厂的厂长，他也有外遇，但是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理智，他的心声是：“我发现，我常常把叶磊看得比工作更重要，但这并没有妨碍工作。”婚外恋给身为干部的他带来更重的情感和理智的折磨。卞海亮还认为：“结婚失去一半自由，当领导失去另一半自由，绝对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他感到痛苦和“因痛苦而来的幸福”。赵长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写过中篇小说《市委书记的家事》等干部题材的作品，但是，在近年来小说中依然写到干部身份的文学人物，赵长天也并不让其陷于“黑金”、“黑洞”等的物欲漩涡，不作黑暗的展览，而是探讨其人性。赵长天把正常的“生活下去”这个理念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如他的《肇事者》中写女性罗燕华：“她漂亮，但没有漂亮到红颜薄命的程度；她聪明，又不是那种偏执的天才，却足够绰绰有余地应付日常生活”；他的小说《以后再说》写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他们是夫妻，他们的谈话无法回避另外一部分的更加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他们共同的生活，那就是他们对共同的将来的安排。”这种叙述性语言则是不自觉地出于一个干部的视角的，他笔下的干部也会常常为自己的言行作出这样的思考吧。于是，即使是写婚外恋，赵长天的小说中总会有转还和比较体面的收场。相比较下，在赵长天小说中的中年人则多以男性更为生动与深刻，而且还总带有一种苏俄小说式的知识分子的气息，带有略显沉重而又无奈的理性与思辨。叶辛的《华都》也绕开了现今的权重位高的干部，欢乐在普通的知识分子和市民们。前几年，全国文坛漫卷旨在暴露官场黑幕的“反腐”小说，在上海的作家中，写这类小说却极少，几近于无。叶辛小说中体现出他最擅长于描写中年女性，他的小说对于人本主义的体现充满都市的世俗化倾向，是一种来自互相连通、由于生存空间的窄小而人们又彼此间无拘无束的弄堂以及因其插队落户生涯而接近的严峻而又优美的大自然的，具有一种市民与农民生活的原生态的美，而没有那种破落贵族的伤感或自怨自艾。姚征冬是本书所占篇幅并不少的一位中年男性，虽然这位男主角所起的作用既有串起一颗颗女性人物的珍珠的作用，但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性格发展与表现。他可以依据自己的身心需要，先后与多位女子发生性关系，他的形象和现代理念更接近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中的庄之蝶，这是平稳而浮靡的当代都市生活所造成的，而正由于姚征冬不是干部，他更有在今天狂欢的理直气壮和不拘一格的理由。他也不需要费神为自己的过度释放的情欲寻找解脱麻烦的办法。

在《华都》中，叶辛对于人体美、对于性爱的描写不少，更多地体现在对女性的描写上，但是他没有去追求一种富于现代夸张感的变形美和荒诞美，叶辛的这种艺术感受与他的个人都市弄堂少年的经历和勇于以韧性和开朗的努力而达彼岸的性格有关。当然，上海的女作家们，如王安忆、陈丹燕、程乃珊所刻划的上海的人与事，写的以及写得好的也都是中年女性了，那些女人们对于日常小事的打算和品味，时而用絮叨和敏感拌和着忧郁或自爱的诗意，有时，写生活中的她对于感情的处理会于忍辱负重中忽然如闪电般地来一次突发的尖利，然后又复归常态。那些女作家所写的性爱，有时充满陶醉，有时带有母性，她们笔下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雨后海棠一般惹人爱怜，更让人注意她们的甜美的情趣和细节，而不去过多探讨她们的命运，那些贵妇即使在受难，她的一切仍然是美的可爱的。而赵长天则在看待笔下女性时保持一种或俯视或侧视的姿态，虽然也描写她们的爱的炽热，但却从情节和描述中，关注并提示她们从情感的烈焰中醒来后将面对的人际、责任等多种因果关系，他即使在写她

们享受性的欢乐，也如一个医生在仪器边默默地观察着一个嗜睡者的脑电图，因为大家都要面对现在和将来的“生活”。而在王安忆和赵长天之间的关于上海女性的小说地带，则由叶辛以他的理解和探索来填补了，除了本文已作出的种种研析，我们还听见了《华都》中那些女性的心声：“青春岁月已经不属于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有欢乐的欲望和官能，既然已经身处于开放的时代，让不会再为受孕和堕胎苦恼的我们酣畅淋漓的享乐吧。”

收稿日期：2004-04-07

作者简介：

林青（1957-），男，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Ardent Middle-Aged Women of Our Time Against Historical Shanghai
——On Characters in Hua Du written by Ye Xin

LIN Q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001, China)

Abstract: *Hua Du*, written by Ye Xin, portrays a series of middle-aged women who once went to live and work in a production team in the countryside and were constrained ment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It is the so-called sociologist who freed them and made them the unbridled women of the metropolis. While Lin Yue, the present radio announcer, and Luo Xiu-yin, the film star of old Shanghai, match each other very well, Xiao Qiu, the hourly working-girl from the countryside foretells the future of modern women in Shanghai. Compared with the characters of Ye Xin's other fiction, these ardent middle-age women in *Hua Du* have many new features of Shanghai school of writers'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Ye Xin; *Hua Du*; contemporary fiction

责任编辑：周成璐